

# 八十年代小說啓蒙敘事主體的歷史生成 ——以“歸來”作家為中心

畢光明<sup>1</sup>

**摘要：**新時期文壇的作家在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勢下紛紛說真話、寫真實，向社會批判、歷史反思和人性反省的各個領域日益深入地掘進，帶來了當代中國文學從未有過的百花齊放的局面，政治形勢的改變的確起了關鍵作用，理論界的呼喚也給予了啓發，但創作意識和創作題材的相互作用最終表現為一定的藝術形態，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作家對生活與人生的體驗。八十年代啓蒙敘事的題材選擇及主題指向，多半與作家歷經“文革”甚至更早的政治運動的生活經驗有關。這一時期啓蒙敘事最有成果的是對自“反右”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知識份子命運和農民命運的慨嘆式書寫，都說明是波瀾壯闊的當代中國社會運動史造就了啓蒙敘事主體，也造就了啓蒙文學的特定形態。

**關鍵詞：**八十年代小說；“五七”作家；啓蒙敘事主體；歷史生成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文學問題史”（批准號19BZW095）之階段性成果。

<sup>1</sup> 畢光明，武漢大學文學博士，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小說學會名譽副會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監事長。

八十年代<sup>1</sup>文學的啓蒙敘事，小說的吶喊成為引人矚目的開端。1977年底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發表，班主任張俊石作為啓蒙者的形象矗立在尚未完全從愚民政策的壓迫下覺醒過來的中國人面前，是他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的孩子”，這一聲喊接續起了將近六十年前魯迅在《狂人日記》裏發出的絕叫。雖說劉心武對中國人遭受的精神奴役遠不如魯迅那樣看得深透，也就沒有絲毫的悲觀和絕望，但是能賦予一個初中班主任以啓蒙者的使命，表明在“文革”造成的精神廢墟上，首先甦醒過來的是小說家的啓蒙意識。當小說着意刻畫中學生宋寶琦和謝惠敏身上的兩種不同形式的蒙昧，作家在思想解放的春風還沒有完全吹進文學界之時就扮演了啓蒙敘事主體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時期文學思考與批判精神的覺醒，並不僅僅是來自於官方發出的批判“文革”的政治話語的提示，更是作家從生活經驗（作者劉心武“文革”中一直是北京市的中學語文教師）中產生的對人的精神問題的關切。劉心武堪稱八十年代小說啓蒙敘事主體的第一個出場者。繼他之後，“傷痕文學”的其他作者，“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現代派文學”“先鋒小說”“新寫實小說”以及其他類型文學的小說作者裏，都有有意反省社會歷史運動和人性對人自身的傷害，並以創作來思考人的覺醒、人的生存價值乃至生命的本質，試圖啓悟讀者的啓蒙敘事主體。文學敢於寫人、人性和人情，敢於批判社會對人的損害，這的確拜改

<sup>1</sup> 從70年代中後期到80年代末，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在思想文化上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它在知識群體以吶喊與批判推動社會進步上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比。在20世紀，也祇有這個時代與“五四”一樣，知識群體取得了話語權並極為活躍，力圖通過歷史文化批判來論證社會變革的合理性，同時以文學敘述來思考人生命運，爭取人的生存權利。因為歷史的需要，這個時代讓文化扮演了主角，不管它表現得如何，它都已佔據了一段歷史舞台的中心，此後無論怎樣的歷史敘述都不可能將它抹去。像“五四”一樣，這一時代已然成為一個非同尋常的歷史年代，歷史讓它出場，歷史也給它命名（並不是所有的時代都有這樣的幸運）——“八十年代”。

革開放之賜，如果沒有讓人說話的政治環境，沒有理論界對人的本體地位的強調，文學創作者敢不敢說和說什麼都成問題。但是，就像寒冬過後，萬物能夠復甦，離不開春風的溫暖，可是能夠在春風裡復甦的是有生命的萬物，並且復甦的萬物必然按自己的生命本性和本能在恰當的時機突破蛰伏期的狀態，長成它原本就有的樣子一樣，新時期文壇的作家在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勢下紛紛說真話，寫真實，向社會的批判、歷史的反思和人性的反省的各個領域日益深入地掘進，帶來了當代中國文學從未有過的百花齊放的局面，政治形勢的改變的確起了關鍵作用，理論界的呼喚也給予了啓發，但創作意識和創作題材的相互作用最終表現為一定的藝術形態，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作家對生活與人生的體驗。八十年代啓蒙敘事的題材選擇及主題指向，多半與作家歷經“文革”甚至更早的政治運動的生活經驗有關。這一時期啓蒙敘事最有成果的是對自“反右”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以來的知識份子命運和農民命運的慨嘆式書寫，都說明是波瀾壯闊的當代中國社會運動史造就了啓蒙敘事主體，也造就了啓蒙文學的特定形態。這個時代的啓蒙敘事主體，心靈裏幾乎都烙有歷史創傷的印記。“傷痕文學”是對創傷的撫摸，疼痛的淚水淹沒了理性思考。“反思文學”裏有更深重的創傷，但是拉開距離之後，創傷就帶來智慧、理性和美感。超越個人苦難之後對製造創傷的歷史進行理性反思，才能看清歷史的真相以及人在歷史中的位置，啓蒙主體也宣告誕生。因此，當代文學知識份子啓蒙意識的產生，無不與20世紀中國所經歷的巨大歷史變革相關，歷史進步和大眾蒙昧的悖論是啓蒙思考中最大的糾結，啓蒙敘事主體都是在痛苦的歷史經驗中形成。由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性、政治運動、家庭出身、教育經歷和社會分工等因素所決定，新時期啓蒙敘事的作家主要有

曾經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在新時期才復出的作家、“文革”中上山下鄉過的“知青”作家、坎坷較小的知識份子身份的作家和從農村出身的作家。本文首先討論 1957 年的反右運動如何“造就”了八十年代小說的啓蒙敘事主體。

—

1957 年，“反右”運動蓬勃展開，一批較活躍的中青年作家被打成“右派”，受到整肅，不少人沉淪到社會的最低層，經歷了種種磨難，直至“文革”結束後，1978 年中共中央做出決定給“右派”平反，他們才紛紛回到文壇，被稱為“歸來的作家”或“復出的作家”，以落難的時間記，又被稱作“五七”作家。小說作家裏有王蒙、張賢亮、從維熙、陸文夫、高曉聲、鄧友梅、劉紹堂等。

反右運動使新中國的知識階層遭到巨創，55 萬多名知識份子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事業和人生被突然改變。被改變的不祇是知識者個人的命運，也是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反右運動是在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成功，社會主義即將由“革命”向“建設”轉型之際發生的，它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的不良後果不難想見。對這種後果，有論者這樣概括：“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化創業奠基期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一方面暫時中止了自 1949 年以來，特別是 1956 年以來中國社會大變革流向中現代化趨向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又開啟了以‘左’傾錯誤為主要內容的反現代化趨向的先河。”<sup>1</sup>對此，金觀濤、劉青峰有更深入的研究。他們贊同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

---

<sup>1</sup> 原文見江燕《反右鬥爭擴大化與中國現代化》，《長白學刊》2002 年第 5 期。此處所引為伍小濤《國內反右運動研究述評》（《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1 期）一文的轉述。

Farquhar) 對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變遷的看法，認為“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變遷來說，1957年的反右運動無疑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以前，無論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藍圖，還是‘八大’的基本綱領，中國共產黨都把現代化建設作為主要任務。正是反右運動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判斷，左的路線開始佔支配地位，政治運動越演越烈。階級鬥爭從黨外到黨內，一發而不可收，一直把中國推向文化大革命。”<sup>1</sup> 在反右之前的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並把發展生產力的經濟建設作為今後黨的主要任務。但是，“八大”方針在黨內高層存在意見分歧，而結果消除這一分歧的舉措就是整風運動和反右，由此殃及知識份子。矛盾的根源就在黨的政治路線的調整：“為了避免史達林晚年所犯的錯誤，‘八大’決定加強黨內民主，反對個人迷信和專斷。根據不搞個人崇拜的精神，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的條文也從黨章上刪去了。1956年1月，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宣佈，絕大部分知識份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國各種新辦雜誌如雨後春筍，知識份子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鼓舞之下正醞釀着思想解放運動。劉少奇甚至指出，鑒於蘇聯計劃經濟祇注重計劃性的教訓，中國還應注重多樣性和靈活性。”<sup>2</sup> 這樣的政治路線變遷，自然不會為黨中央所贊同，因而促使他們運用延安整風模式來重塑共產黨的政治文化，而1957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就是整風模式必經的階段，“正是它改變了廣大共產黨員的心態，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絕對權威，從而扭轉了‘八大’路線，使中國走向

<sup>1</sup>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

<sup>2</sup>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

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sup>1</sup>這樣的論述顯得有些簡單，反右運動與後來的大革命聯繫並不那麼直接。整風運動的第一階段是整風動員和大民主，運動一開始強調暢所欲言地向黨和領導提意見。運動的第二階段為批判對立面，讓全體黨員在大批判中集體修身，純化無產階級立場，它以大批判和審幹作為手段。運動的第三階段是黨做出決議，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確立。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創造出一種可以將全黨思想高度統一起來的人群體意識形態認同模式”。通過對比分析他們發現，“1956年至1957年這兩年，中共指導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處於與1942年延安整風前夕類似的局面；毛澤東雖然掌握了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權，但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意識形態藍圖）卻出現了某種不確定性”，於是1957年毛澤東有意識地運用延安整風模式來統一全黨思想，運動步驟與延安整風相同，而“鳴放突然變成反右，祇是1942年延安整風中大民主轉向批判王實味之重演”，其結果是反右同樣起到了延安整風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意識形態絕對權威的作用，至反右最後一個階段完成，“‘八大’決議不攻自破，毛澤東思想再次從馬列主義中凸現出來，成為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核心，並且逐步成為指導億萬工農群眾參加群體修身運動的經典。”<sup>2</sup>這樣的觀察同樣有些簡單化，其實全黨全民已達成共識，毛澤東提出的取代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新藍圖才是唯一正確的，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和三面紅旗，因之從1958年開始中國走上了全民動員以搞政治運動的方法進行經濟建設的道路，並且意識形態的鬥爭的重要性始終壓過了經濟的發展，經過“大躍進”“四清”，終於發生了

<sup>1</sup>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

<sup>2</sup>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

“文化大革命”。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場反右運動明確了他們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階級性質，使其在中國歷史上遭到前所未有的社會排斥，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都徹底喪失了主體地位。由於反右運動“以言定罪”，知識份子從此喪失了對政治、倫理道德和公共生活的批評權力。這樣的現實，也把知識份子推向了孤獨體驗和痛苦思考的生命歷程，它預示着中國社會祇要重啟現代化構想，就必然以一場啓蒙運動來開路，而經歷過社會曲折的知識份子一定會成為歷史反思的中堅。

現代知識份子從退出“五四”啓蒙運動的廣場，到在人民革命運動中被邊緣化，再到反右運動中成為被打擊的對象，對這一變化過程起重要作用的是階級論的歷史觀和這一觀念在政治文化權力建構中的被運用。反右運動被鼓勵給黨提意見的知識份子，突然遭到反擊後毫無還手之力，就因為知識份子被判定為屬於資產階級，所以在被指責沒有無產階級立場而成為資產階級反黨的代言人時，祇能理屈詞窮。反右運動打壓知識份子，採用的方法就是讓工農大眾參與批判，例證是1957年6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動員反右的社論《工人說話了》，就把右派問題的本質直接歸到知識份子的出身上，而這正是領導人倚重的建立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再一次運用。三十年代以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史上知識份子的窘境與末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毛澤東對知識份子階級屬性的認定。李銳為探討反右運動的起因，梳理過20年代以來毛澤東關於知識份子的論述，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從政治生涯的開始，就對中國知識份子有很深的成見了”。<sup>1</sup>他在文章裏介紹，毛澤東從早年開始，他就對知識份子特別是大知識份子帶有很深

<sup>1</sup> 李銳：《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

的成見，在 1925 年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原文裏，就有將知識份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論述。延安時期為同國民黨爭奪知識份子才對知識份子的說法略有改變，1939 年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到“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知識份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此時他將知識份子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但是，“波匈事件之後，他的說法就不同了。在 1957 年 3 月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也就是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前三個月，他兩次談到知識份子階級屬性問題，一次是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的：‘有人問資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區別，我就分不出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於一個範疇。‘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252 頁）。”“幾天之後，毛澤東在大會上又把這意思說了一遍：‘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份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同上書，第 273 頁）”由此李銳認為：“在當年舉國黨化教育即階級教育的形勢下，這種定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將知識份子劃歸資產階級範疇，就是劃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也就是劃入需要加以打擊的社會成分；這也就為開展一場整肅知識份子的反右派鬥爭奠定了理論基礎。”<sup>1</sup> 這些論述，一定程度上是對反右運動歷史根源的揭示，但從中也可看出階級理論與啓蒙的關係。如果說，革命動員主體用階級論否定了知識份子的啓蒙者身份，贏得了無產階級

<sup>1</sup> 李銳：《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炎黃春秋》2008 年第 7 期。

人民大眾代言人的資格，那麼，“五四”的啓蒙不是被“救亡”壓倒，而是被另一種啓蒙所替換，祇是這種啓蒙用道德理想主義壓制了知識理性，結果製造了新的蒙昧，也使人本主義的啓蒙者陷入倫理困惑。這就是後來王蒙和張賢亮在複出後小說裏反覆審視的“五七”一代（知識者與工農）的精神圖景。

## 二

反右運動在精神和肉體上摧殘了作為社會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給國家和社會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55萬知識人蒙冤受屈，墮入逆境二十餘年，當1978年中共中央給右派平反的陽光照耀到他們身上時，能夠接續曾經起步的事業的人，所佔的比例其實很小。文學從業者較為例外。反右之前就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在經歷二十餘年的坎坷之後，重返文壇正值盛年，創作不僅猶如井噴，作品內涵的深厚豐富也遠非當年可比，這都是被打成右派後九死一生的經歷給予他們個人和中國文學的回報。

在經過對他們的言論進行口誅筆伐的批判鬥爭之後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在運動過後都受到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懲罰。視階級出身和言論錯誤的程度而定，最輕的是在原單位接受監督改造，嚴重的是開除公職送到農村勞動，更為嚴重的是勞動教養甚至判刑勞改。不管以哪種形式懲罰，統統稱為“改造”。有論者將“改造”的方式歸納為“流放‘改造’”“勞動‘改造’”“饑餓‘改造’”三類，<sup>1</sup>並引用右派的自述說明“改造”的嚴酷性。如轉述戴煌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學林出版社2000

<sup>1</sup> 劉豔華：《論對“右派分子”的“改造”》，《世紀橋》2003年第6期，第29—30頁。

年版)裏右派“勞動‘改造’”的情況：“‘右派’們在北大荒等地扮演的角色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勞動大軍。他們傾其所有的力量，忍受着奴役般的待遇，掙扎在死亡線上……起初，‘右派’們抱着重新回到黨的懷抱的願望，毫無怨言地苦幹着。每天早四點起床，直到晚上七八點鐘才休息，在這十五六個小時內，除了簡單的三頓飯和洗臉的時間外，基本上是不停地勞動。要想寫封信，得用幾天的勞動間歇時間，才能草草地寫完。髒衣服和泥襪子祇好堆在屋外牆角下，洗澡更是一種奢望。據戴煌回憶：在‘大躍進’放衛星時期，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水庫工地上，他們穿着薄薄的棉毛衫褲，口呼白氣，每人每天如果完不成7到10立方土的定額，即便深更半夜也不收工，有時連續苦戰五六個小時，‘歇口氣’祇有五分鐘。利用這五分鐘的休息時間，他們連忙披上棉襖，站在溝裏拄着鐵鍬就睡着了。為了節省上下工長途跋涉的時間和精力而多幹活，把被窩鋪在透明的冰層上，而不讓回駐地，連夜苦戰，有時窩窩頭也凍成了冰疙瘩，用斧頭劈碎了就往嘴裏塞。”又如舉到一個“饑餓‘改造’”的案例：“有位姓羅的‘右派’，早晨和大家一起出發，可到中午他才挪到地裏，他準備打飯時，監工卻破口大罵道：‘你他媽的還想吃飯？去、去、去，這裡沒你的飯！’第三天，他就餓死了。有的難友餓得實在走不動，坐下來歇口氣再走，可他再也沒站起來，有的難友餓成皮包骨，活活餓死在集體宿舍的打通炕上。一位歸國華僑，餓得毫無辦法時，給英國的父親寫了信，父親寄來幾桶奶粉，就被扣上了‘喪失國格’，‘破壞了新中國的政治影響’的帽子而被批鬥，在黑

<sup>1</sup> 劉豔華：《論對“右派分子”的“改造”》，《世紀橋》2003年第6期，第29—30頁。

夜中投井身亡。”<sup>1</sup>用原始的體力勞動和饑餓亦即生存的威脅來對因言獲罪者進行改造，無論從改造的動機和改造的內涵來說，都不具有現代性，都與現代文明無緣，讓人懷疑改造的目的就是讓改造對象祇能接受改造，它暴露的是反右運動建構社會權力關係的行為嚴重匱缺人文性。

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同樣經歷過這種看不見出路的改造。例如張賢亮和從維熙都當過勞改犯，高曉聲下放回農村當農民，王蒙也一度下放到北京郊區勞動。1957年7月，時為甘肅省文化幹部學校教員的張賢亮，受“鳴放”氣氛的鼓舞，在西安的文學月刊《延河》發表了長詩《大風歌》，抒發了滌除舊事物迎接新生活的青春激情，旋即受到批判，批評者認為“這首詩的政治傾向是‘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詩中表現出來的思想感情與我們今天的時代感情是敵對的。作者以他那極其陳腐、反動的思想感情淹沒我們今天的時代聲音。’”<sup>2</sup>“《大風歌》露骨地表現了作者對我們這個社會的不滿和仇恨”，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企圖背叛我們這個新時代的歌。”<sup>3</sup>張賢亮因此被打成“右派”，跌入二十二年的“大牆”生涯，嘗受了“勞教”“勞改”“群專”“入監”等各種懲罰方式，遭受的是非人的對待。從維熙被劃為右派後，輾轉於營門鐵礦、茶澗農場、團河農場、曲沃磚場、晉普山煤礦、大辛農場、伍姓湖農場等勞動改造場所，跟張賢亮一樣，有過刻骨銘心的“大牆”生活體驗。高曉聲也是反右之前就有文學作品引起文壇注意，1957年與方之、陸文夫、葉至誠等籌組“探索者”文學社團，起草《“探索者”文學月刊啓事》，並發表了把宣言具體化的探索小說《不幸》而受到批

<sup>1</sup> 劉豔華：《論對“右派分子”的“改造”》，《世紀橋》2003年第6期，第29—30頁。

<sup>2</sup> 馬占俊：《“反右”運動中張賢亮及其〈大風歌〉批判始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2期，第122—131頁。

判，被劃成右派，遣送回原籍江蘇武進農村“勞動改造”，當了多年地地道道的農民，“文革”中受到衝擊。1956年發表短篇小說《小巷深處》而贏得好評的陸文夫，也因籌辦“探索者”文學社而被打成右派，長期在農村、工廠勞動改造。相比起來，王蒙被錯劃為右派後遭受的處罰相對較輕。王蒙1948年就在北平的一所中學裏參加了地下黨，入黨時還不滿十四歲。北平解放後，他成了北京市一名工作熱情高漲的共青團幹部。1956年在《人民文學》發表短篇小說《组织部新來的青年人》，產生強烈反響，在1957年引起爭鳴，雖然一度得到毛澤東的關注，但是經過反覆分析批判，王蒙還是因這篇名作而成了右派行列裏的一員，在北京郊區的門頭溝的桑峪、一擔石溝、三樂莊等地參加勞動。直到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被分配到北京師範學院任助教，但由於全國的刊物都不敢發表他的作品使他感受到公雞不讓下蛋母雞不讓打鳴般的憋悶而主動放棄了北京的工作，經申請並得到批准與接受，於1963年舉家遷到了新疆烏魯木齊，先是分配在《新疆文學》當編輯，1965年去了伊犁，在伊寧縣紅旗人民公社二大隊擔任副大隊長，後來又回到烏魯木齊，入過幹校，1979年才返回北京，同年獲得平反，結束了長達16年的自我流放生涯。

不論得到的處罰是輕是重，經受的磨難是多是少，這些作家在被打成右派時，都體會到一生中最難忘卻的恐怖，因為在以政治態度和政治地位來衡量人的存在價值的50年代，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就等於被判了政治死刑。這樣的政治打擊，也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轉折既是生活道路的，也是精神向度的。在反右運動前，他們是新中國文學體制的受益者，他們的社會認同與存在感是統一的；成為右派後，個人與社

會的統一性就被外力強行撕裂，身份認同因認知的紊亂而難以形成，不能不產生巨大的精神焦慮。王蒙在 1979 年平反後創作的以反右為題材的小說《布禮》，開篇寫的就是主人公鍾亦成被打成右派後的驚愕感。鍾亦成像作者王蒙一樣，有着光榮的經歷，十五歲不到就加入了地下黨，是個少年布爾什維克，解放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積極熱情，慷慨激昂。在正在進行的反右派鬥爭中，作為黨的青年幹部，他像以前對待政治運動一樣毫無保留地參加，還是辦公室領導運動的三人小組的成員。哪知正在他熱情高漲地投入運動時，他做夢也想不到他自己出了問題，由於他發表在一家報紙上的祇有四句的小詩，被一位紅得發紫的文藝評論新星硬是分析成了向黨進攻，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之作。單位的反右運動，立刻找到了靶子，在集中火力的批判下，把黨看作母親的少共鍾亦成被坐實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這樣的結論，令他無比震驚，生命的感覺能力都被改變：“這是怎麼回事？忽然，一下子就凍結了。花草、天空、空氣、報紙、笑聲和每一個人的臉孔，突然一下子都硬了起來。世界一下子降到了太空溫度——絕對零度了嗎？天空像青色的鐵板、花草像雜亂的石頭，空氣液化以後結成了堅硬的冰塊，報紙殺氣騰騰，笑聲陡地消失，臉孔上全是冷氣。心，失去血色，硬邦邦的了。”<sup>1</sup> 政治宣判使生命的感覺降低為零，可見反右給予鬥爭對象的是致命的打擊，政治鬥爭也因此暴露出它的非人道本質。王蒙重返文壇發表的第一個中篇，再現的就是改變他命運的那一個瞬間，說明二十多年的時間都沒有抹去這個給他人人生恥辱的感覺記憶。反右鬥爭否定的不祇是一個熱血青年對改變世界的革命熱情，它否定的也是追求自我價值實現的人的本質。《布

<sup>1</sup> 王蒙：《布禮》，《當代》1979年第3期。

禮》明顯地帶有自敘傳的色彩，因此，鍾亦成的心理感受也可以看作是王蒙當年被打成右派時的感受。在小說裏重新體味那種死亡感覺，何嘗不是在為主人公的疑惑找到一個理由，而疑惑是新生的開始。《布禮》在敘事時間的錯置裏，隱藏着革命信徒鍾亦成從癡誠到懷疑的心理軌跡，如果說在他的心靈裏掙扎的是革命的吊詭，那麼，把這一世紀難題帶進小說，表明作家王蒙已經是自覺的啓蒙敘事主體了。

### 三

張賢亮的身份認同危機也在小說人物的心理糾結中得到體現。在五七作家裏，張賢亮有更強的知識份子意識，也許祇有這樣的認同方式才能使他在被劃為異類後還能得到自我拯救。在漫長的改造生涯中張賢亮產生過怎樣的精神危機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從他復出後的小說裏可以看出知識人在異質環境裏戲劇性的精神活動。極左的政治權力剝奪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和話語權的最好方式，就是讓腦力勞動者變為體力勞動者，這樣前者的優勢盡失，在肉體的折磨中看出自己的無能與無用，祇得臣服於階級論的歷史學說和無產階級的道德理想主義。然而，知識賦予知識主體的認知能力、批判精神和文明責任感，並不會因為職業的變換而消失，所以勞動改造反而給知識份子以新的認知機會，祇是新的認知過程始終會伴隨自我認同危機。這種危機往往由生存危機所導致。在饑餓的年代裏，右派分子章永璘最大的痛苦是食物極端匱乏，他祇好不顧體面和道德，調動知識人的智慧謀取吃食，後來還甘願接受勞動婦女的餵養。但是，每當饑餓的肉體痛苦解決之後，精神痛苦便接踵而至，“我知道我肚子一脹，心裏就會有一種比饑餓還要深刻的痛苦。餓了

也苦，脹了也苦，但肉體的痛苦總比心靈的痛苦好受”。<sup>1</sup> 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的墮落，發現自己背叛了自己的知識份子的精神職能，完全被物質的世界所俘虜。這大概就是知識份子作為精神存在的體現，不僅要活着，還要追問活着的意義，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在痛苦的、無法理解的現實裏，章永璘被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這兩面的分裂所撕扯。在勞改農場裏，白天要為謀得吃食而降低人格、挖空心思，而到了晚上就要為審視自我而感受“如碎玻璃似的鋒利的碴子碾磨着”的痛苦：“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驅使，我諂媚，我討好，我妒忌，我要各式各樣的小聰明……但在黑夜，白天種種卑賤和邪惡念頭卻使自己吃驚，就像道林·格雷看到被靈貓施了魔法的畫像，看到了靈魂被蒙上的灰塵；回憶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開它的畫卷，我審視這一天的生活，帶着對自己深深的厭惡。我戰栗，我詛咒自己……可怕的不是墮落，而是墮落的時候非常清醒。”<sup>2</sup> 章永璘意識到自己已經被迫墮落，但是知識份子的主體意識不允許他屈服於現實，也不能把墮落的原因僅僅歸咎於客觀現實：“我不認為人的墮落全在於客觀環境，如果是那樣的話，精神力量就完全無能為力了；這個世界就純粹是物質與力的世界，人也就降低到了禽獸的水準。宗教史上的聖徒可以為了神獻身，唯物主義的詩人把崇高的理想當作自己的神。我沒有死，那就說明我還活着。而活着的目標是什麼？難道僅僅是為了活？如果沒有比活更高的東西，活着還有什麼意義？”<sup>3</sup> 人祇有意識到生命的精神價值才算獲得了主體性，才能理性地思考所面對的一切，那麼張賢亮讓小說人物所說出的正是啓蒙的核心思想，而這樣的啓蒙話語，它的出

<sup>1</sup> 張賢亮：《綠化樹》，《十月》1984年第2期。

<sup>2</sup> 張賢亮：《綠化樹》，《十月》1984年第2期。

<sup>3</sup> 張賢亮：《綠化樹》，《十月》1984年第2期。

現早於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啓蒙”說和“主體性”文論好幾年。可見八十年代文學的啓蒙敘事並沒有為新啓蒙理論批評話語所規限，新啓蒙運動也不是如許紀霖所說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反右運動讓中國的知識份子歷經了“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鹹水裏煮三次”的苦難歷程，這一歷程也是他們真正接觸社會底層，瞭解社會真相，也反省人生價值的過程，八十年代小說啓蒙敘事由他們擔綱有歷史的必然性。

但是不能把歷經人生苦難看作啓蒙敘事主體形成的必要條件。苦難經歷或能磨鍊人的生存意志，還會迫使人反省生存的意義和價值，但是苦難也可能導致受難者心理異變。例如從維熙回歸文壇後創作的《雪落黃河靜無聲》所塑造的范漢儒這一知識份子形象。小說用不合常情常理的行為表現來證明范漢儒品格的正直、節操的高尚和愛國感情的執著。范漢儒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歷史系教授父親給他取這個名字就是希望他做個繼承了傳統人格的讀書人，他果然不負所望，以“中華民族一個腐儒”自居和自得，崇拜廉正，在亂世之秋潔身自好。他被打成右派，在勞改農場裏當了“雞倌”，在大饑荒的日子裏，雖然餓得兩眼發昏，但他寧可用野菜煮耗子肉吃，也從不沾公家一星蛋花，連被老鼠拖走的幾個雞蛋也四處挖洞找回來交了公。最能體現他情操高尚的是他無論在什麼境況下都不忘自己是炎黃子孫，把愛國看成是一個人最大的貞操。用他的話說：“我認為無論是男人、女人都有貞操，一個炎黃兒女最大的貞操，莫過於對民族對國家的忠誠。”正是出於這樣的觀念，他在勞動農場與學醫出身的女犯人陶瑩瑩成為戀人，“四人幫”粉碎後，他倆都出獄成為自由人，兩人本可以結成眷屬，但是，他得知陶瑩瑩當初入獄犯的是叛逃罪，於是完全不顧陶瑩瑩當初的叛國行動儘管是錯誤的但

事出有因，服法之後她為自己罪孽的深重從未停止過自責和懺悔，而斷然割斷了與陶瑩瑩的患難之情，他的理由是：別的錯誤都能犯了再改，唯獨對於祖國，它對我們至高無上，我們對它不能有一次不忠。范漢儒忠貞的愛國之情十分可貴，但是，他在處理與陶瑩瑩的關係上卻是感情用事的，而不是經過了理性思考，因為國家都可以用改造去挽救一個罪人，為什麼一個愛國的知識份子卻不可以用自己的大愛去拯救人生遭遇不幸的戀人呢？可見范漢儒割斷在患難中產生的戀情，不僅缺乏理性基礎，也缺乏人性基礎，他的愛國更像是對“炎黃子孫”這種概念的崇拜，而這樣的崇拜跟他希望用崇高的道德來修復被政治打擊損毀的自我人格形象不無關係。通過犧牲他人來保全自我，通過這種方式來滿足自我的認同需求，反映出心理並不健全，更談不上成熟。因此，《雪落黃河靜無聲》的敘事帶有反啓蒙的傾向。